

耳谈

三教九流无所不

正人君子鬼蜮魍

生动描绘了明代

对「三言二拍」

《聊斋志异》的

有很大影响

但因有违碍 清代绝版

今据孤本首次校注出版

●「明」王同軌 撰

●孙顺霖 校注

●明清文言小说
选刊

●《耳谈》成书于明万历丁酉年

十五卷五百四十六篇书名为耳听谈闻之意

书中人物帝王将相

包

魍应有尽有

世俗风情

创作



明清文言小说选刊

耳 谈

【明】王同轨撰

孙顺霖 校注

责任编辑：弦 声

责任校对 孙宝瑞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农业路73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河南焦作市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插页12.125印张 301千字

1990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480册

ISBN 7-5348-0307-1/I·149. 定价：4.85元

耳談序



南新市李維楨撰

吾友王行父博學宏詞坎壈一第
而以此貴為上林丞需次都門久
不奏除四方學士大夫慕行父
名相過從綿綿縞之交者日衆

新刻耳譚卷之一目錄計三十一條

木毬使者

碧葬

瓦棺

劉儼姑

宗諫議

武騎尉金三

屍異

苟儼姑

江進士鍾廬

劉進士子

梁太宰封君

黃金箔

顯靈宮道士

浙士人

沈休文女

保安州城隍

某孝廬

諸葛一鳴

新刻耳談卷之一

黃岡王同軌行甫撰

上饒門生王嗣經校

木毬使者

武廟時西湖上有板菴大覺禪師為神僧創造佐國寺極弘麗而其資累數十萬皆其所遣木毬使者丐乞於諸檀那所得使者大如斗圓如毬繪以五綵無翼而飛不脛而走每到人家若侯門戚里富賈大商以前點地作叩首狀人皆笑迎使者爭為輸金即禁禦清嚴之地皆為喜捨之資而黃門不知所由入

新刻耳談卷之三

黃岡王同軌行甫饌

上饒門生王嗣經校

韓清

韓清者洛陽諸生而抱異術守趙公喪妾憂甚思得清雅士與談博未言也重門皆閉忽一士歷堦而上曰韓清上謁公亦耳其名曰汝從何來曰公心欲為平原故不佞請為毛遂不干典謁正發公一笑耳公大笑與談博累日夜憂頓解然清之父掾也竊邑藏金無算並其母置囹圄清一日來別且道其事公曰

前言

中国的笔记小说，汗牛充栋，名家辈出。它以篇幅短小，语言精练，笔锋犀利，在中国文坛上独树一帜。《耳谈》就是明朝中叶王同轨的笔记小说集。

王同轨，字行父，明黄冈（今湖北省属）人。生卒年不详，约生于明嘉靖中前期，卒于万历末年或天启初年。王同轨生于小官僚家庭。其曾祖官郎中，祖父任封丘令，其父情况不详。其叔父王廷陈，字稚钦，明正德丁丑年进士，选翰林庶吉士，授吏科给事中，因谏武宗南狩，黜知裕州，又因失职放废，削秩归。屏居二十年，嗜酒纵倡乐，常穿红衣窄袖骑牛跨马啸歌田野间，留下的诗文有《梦泽集》。明文学家冯梦龙在《谭概》中曾记：“黄冈王廷陈，字稚钦，少负奇才，然好逐街市童儿之戏。父母挟朴之，辄呼曰：‘大人奈何虐海内名士！’”

王同轨从小就家学，习举业，由于家庭的教育和熏染，他“博学宏词”（李维桢《耳谈》序），工诗。然而却仕途乖蹇，“坎廪一第，而以铉为上林丞。需次都门，久不奏除”（引文同前）。后又“以贡生除江宁知县，迁南太仆主簿”（《明诗记事·庚·卷三十上》）。“尝从吴明卿出游，与王弇州、李云杜善。”（《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他一生“作诗不多，自有风格，不欲寄诸公篱下”（引文同前）。“四方学士大夫，慕行父名，相过从，缔绶縡之交者日众。”（李维桢《耳谈》序）
《耳谈》卷六二曾录有他《行山中》诗：“雨余林气静，山

晚日光斜。野店依孤树，村桥卧断槎。马嘶遥涧水，犬吠隔林花。白首钁云者，春风自一家。”《明诗记事·庚·卷三十上》也录其《赤壁楼上同弟绥父陪刘维芳雨集》：“登楼披秀色，尊酒暂从君。槛集千峰雨，窗流满榻云。鱼龙寒自蛰，鸿雁暮为群。共醉空明上，人间世界分。”他的诗曾结为《兰馨集》，又称《王江宁集》。

王同轨在作京官和知江宁县时，在同友人聚会、漫游中，注意收集异闻逸事，并将其辑为《耳谈》一书，“亦《夷坚志》之流”（《湖北通志》铅印本三，第3751页）。“每条皆记所说之人，以示征信。”（《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四·子部·小说家存目二》）《耳谈》记明代“上下百年”之异事，为“交游所称述”（《江盈科《耳谈引》》）。

二

王同轨之所以把他的笔记小说集命名为《耳谈》，文人论述不一。据他的朋友，京山人李维楨作的《耳谈序》称：“荀卿有言，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四寸耳，何足以美七尺之躯。是行父称名意也。”曾作《明十六人小传》和《雪涛小说》的江盈科在《耳谈引》中称：“夫耳横一寸，竖倍之，入窍三寸，才数寸耳。其中所受，自单词只语，至亿万言，不可穷诘。……耳固人所共有，耳之闻亦人所共能。……夫耳，等也。在余为邮舍，在行父为府藏。邮贫藏富，非其耳异，用之异耳。”王同轨本人在《耳谈自序》中也说：“予游蓟门，奉士大夫麈谈，纷此种种。而京师翼翼，人物凑杂，厥事尤伙。因札记之曰《耳谈》。”也就是说，耳谈，是耳听之谈闻。

说到“谈”，是大有讲究的。老子曾说过：“谈言微中，可以解纷。”是说谈话如能切中要害，可以解决纷繁的矛盾。明代梅之炳在为冯梦龙的《谭概》作的《叙》中说：“然则‘谈’何

容易！不有学也，不足谈；不有识也，不能谈；不有胆也，不敢谈；不有牢骚积郁于中而无路发摅也，亦不欲谈。夫罗古今于掌上，寄《春秋》于舌端，美可以代舆人之诵，而刺亦不违乡校之公，此诚士君子不得志于时者之快事也！”

然而，王同轨到底有那些“牢骚积郁于中而无路发摅”？又怎样“不得志于时者”呢？这要从他坎坷的仕途生涯和明中叶的封建黑暗统治中寻找答案了。

王同轨出身于书香门第，幼习举业，希冀仕途显达，耀祖光宗，报效朝廷。然而事实却跟他开了个大玩笑。“坎廪一第，以铨为上林丞。”可见他寒窗十载，铁砚磨穿，到头来只是个老贡生，连进士也不及第，只是靠输资当了个上林丞这样的八品京官。这对于一个满怀抱负，才高气盛的人无疑是个大的打击。于是只好偕友出游，赋诗饮酒了。仕途坎坷，怀才不遇，这是“积郁”之一。

王同轨在任京官的过程中，同僚们贵的贵了，显的显了，只有自己“需次都门，久不奏除”。加之权奸当道，东西厂、锦衣卫特务横行，朋友之间聚聚会，饮饮酒也受限制和被监视，这样，作为一个稍正直一点的人，又怎能不受压抑，又怎能不牢骚积郁胸中！这恐怕是“积郁”之二。

有积郁就有牢骚，有牢骚就要找人、找地方发泄。可是当时的明王朝的封建统治是极为腐朽的。皇帝昏庸，宰相擅权，宦官特务横行，正直的知识分子受迫害。当时的文人集团公安派首领袁宏道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一语道破了明中叶的政治黑暗：

“吏情物态，日巧一日；文网机构，日深一日；波光电影，日幻一日。”有谁敢咳一声嗽呢？这在王同轨本人的《耳谈自叙》中也承认：“道合幽明，文网犹地狱。”牢骚不敢发，没地方发，这恐怕是“积郁”之三吧！

然而，牢骚还是要发的。怎样发？文人自有文人的办法：不

能直书，用曲笔；不敢明言，以暗喻；不写出于己口，用道听途说；不让写人间，搬出鬼神。这在《耳谈自叙》中亦说得十分明白：“氏以识今一代淑诡幻怪事，日来沉痾未解。……人谋鬼谋，百姓与能；余庆余殃，善不善在积。故曰：为不善于明显之中者，人得而诛之；为不善于幽暗之中者，鬼得而诛之。……逃乎明，不能逃乎幽。”江盈科在《耳谈引》中又说：“余观行父此书，事新而艳，词爽而快。怒读之则喜，愁读之则畅。撮其大旨，往往使人惊悟，安义命而绝邪萌。风世回俗，所补不小。乃拘挛者见谓过奇，或诋为诞，不思理有万变。理中之理，径而易寻；理外之理，势而难朽。”李维桢的《耳谈序》说得更加明显：“行父之谈，出于稗官，其指非在褒贬。厌常喜新者读之，欣然脍炙，适口而无所虞罪。故事不必尽核，理不必尽合，而文亦不必尽讳。……世有能言之士，上不得坐而论道，谋王断国；其下不得总揽人物，囊括古今，修辞赋之业，而第猥杂街谈巷语，以资笔酒谐谑之用。……此文士不遇之一征已。”这便是《耳谈》之为耳谈而已！曲笔谈鬼神以讽时世，借以发泄胸中积郁，这在明中后期是文人士大夫共用之手法。

三

《耳谈》作为笔记小说，体系庞杂，内容繁芜。从内容上分类，有写人的，也有记事的；有可资参考的珍贵史料，也有逸事传闻；有神魔，也有鬼怪。从质量上看，有精华，也不乏糟粕。现大致划分于兹，供读者研讨。

一、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这一部分虽然不多，但却是书中的精华。如《碧葬》、《瓦棺》、《本朝异擢》、《传奇辨》等。《耳谈》卷一《碧葬》条记：“新都殷司徒家，掘池得古冢。冢砖长五寸许，皆有字云：‘歙东萧司马碧葬’。而不知碧葬之义，以问汪伯玉司马。伯玉考之：凡死忠不得尸者，得血以

葬，曰‘碧葬’。岂碧化苌弘之血义耶！”全条仅六十九字，将碧葬解释得清清楚楚，为我们解决了考据中的一个难题。《瓦棺》条记四川南充某村掘地，得瓦棺成千上万，“棺内皆男女枯骸”。作者虽“不知何物”，但据文义推论，很象奴隶制社会的墓葬。这对我们研究古代社会和墓葬制度提出了一条重要线索。卷二《传奇辨》，作者论证元传奇《琵琶记》、《破窑记》、《吕蒙正风雪饭后钟》、《单刀会》等与史实大相径庭，提出了个人的见解。

二、向往婚姻自由，歌颂女子奇才。这一类在书中占一定篇幅。如《某孝廉》，写一无赖，以妻子作赚具，设骗局，妄图骗某孝廉的财物。其妻向孝廉告发了全部阴谋，与孝廉私奔，使其丈夫人财两空的故事。篇幅虽短，结构严谨，情节曲折，人物形象生动。《王玉英》则写福清秀才韩庆云掩埋王玉英遗骸，二人成人鬼夫妇之事。王玉英不仅为韩生子，还留下诗集《万鸟鸣春》十余卷。作者称此“才女世上罕见”。《某郡丞姬》更是一篇楚楚动人的佳作。它写某郡丞的爱妾才敏绝出，工文博识，熟读六竹箱书，经、史、星、纬、兵、农、医、卜无不精贯。她不仅常为郡丞解难辟疑，呈文断案，还技压群医，治好丈夫的疑难疾病，被称为“才妇人”。以有力论据批驳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礼教，《杨闷儿》则写的是林二公子在京城与名妓杨闷儿相爱，盟誓矢娶。林回去后摄于封建教条忘弃前约，杨忧郁病卒。作者叹杨“花貌棘心，千古薄命”。在给予极大同情之时，鞭笞了封建教条是杀人的软刀子。此则被冯梦龙的《情史》所转载，是否冯氏以后构思《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本事，值得研究。

三、抨击时世，揭露官场的污浊。黑暗的封建统治，官场里充满着尔虞我诈、倾轧吞食的腐败现象。作为封建士大夫阶层的进步文人，抨击时世，揭露官场的污浊便成了他们的创作主题。拟藉此缓和日益激化的阶级矛盾。王同轨在《耳谈》里，是以大

量的篇幅，采用多种手法来进行揭露和抨击的。《武骑尉金三》就是写金三从小被舟师收养，并招赘为婿。但当金三的血汗被榨干后，被“岳父”一脚踢开。后金三骤富。岳父母无地自容，金三夫妻团圆。深刻揭露了封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批判了嫌贫爱富的社会恶习。《进士郭公》写郭进士贪昧库银，杀人灭口，最终得到报应；《湖南别驾》写别驾因索民财不遂，连毙二命，后世遭报。都不同程度地刻划了封建官吏的丑恶嘴脸，揭露了他们滥用职权，杀人聚敛，中饱私囊的残暴罪行。《李博士》则是写李被鬼索去，行贿得脱，后鬼卒年年逼债，李躲之不及，终被逼死的事。明写阴司，实讽人世；虚写阴曹鬼判，实指明代官场，以阐发作者的“幽明一理”的创作意图。又如《兴化举子》是揭露考场舞弊的事，讽刺了封建科举制度，发泄了作者胸中的积郁。《沈万三》写豪夺珍宝贿赂公行；《先大王父封丘令》写阁臣太宰马文升“役民治第”，农夫苦不堪言的悲惨场面。此外，王同轨喜笑怒骂皆成文章，在《鳖异》条中借庖人剖鳖，剖出二鬼判，“朱发蓝面，皂帽绿袍，左执簿，右执笔”，咒骂封建官吏是不入人伦的“鳖子”（王八蛋）。这些不难看出，王同轨虽然加进去些轮回报应、神魔鬼怪，但主旨明确，为我们认识明中叶的社会现实打开了一个窗口。

四、揭露佛道的虚妄害人。明嘉靖、万历年间，皇帝崇尚佛道，服食丹铅，妄图长生，一些骗人有术的道士被封官进爵，一跃成为“国师”，横行不法。这样，佛道借统治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作了欺压、愚昧人民的帮凶，佛道成了套在人民脖子上的又一条锁链。《显灵宫道士》不守戒规，四出行淫，惨害百姓。更为甚者，他竟惨杀一行路小儿，咒之成术，以满足其淫欲。文字虽简，寓意颇深。另外，书中的道士，有戏逗娼妓的，有借祈雨、镇妖骗取钱财的，不一而足。最传神的一篇是冯梦龙收入《谭概》的《二孺僧》。其一奸僧用骗术大骗钱财挥霍。另一奸

僧则见农人的牛肥，欲窃为己有杀食。于是，每日在秃头上抹盐水让牛舐之，“久遂成习”。后至农家，诈称牛是其父转世。牛主人牵出牛后，牛即就僧舐头。僧骗到牛后，不仅杀食，还将剩肉团成肉丸，藏于竹杖内，以“坐关不食”继续骗人。读后使人喷饭之余，对僧道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当然，书中也不泛吹嘘佛道之作。这反映了时代的特征和作者的思想局限性。

五、传闻轶事。这一类数量最多，可谓瑕瑜互见，鱼龙混杂。属异闻的有《尸异》、《尸变》、《异产》、《异病》、《郢氏鬼异》、《神梦壁语》等等。异闻中多系道听虚妄。然而有一部分则是属自然现象，只是当时科学不发达而无法解释，少见多怪而已。如《异产》记一胎多产、女产蛇胎等等。属轶事的有《江进士钟廉》、《本朝异擢》、《浙榜三公》、《沈石田画》、《海上探珠人》、《戚大将军》等。这一类多记明中叶的名人轶事，有作者亲睹，也有道听途说，都从不同侧面，不同程度地充实了地方史料。如《戚大将军》写民族英雄戚继光严格治军，其子作战失利后退，立即斩首示众，转败为胜。对我们深刻认识这位平倭将军的英雄业绩提供了一条重要的佐证。也正因为是轶事，所以也记载了戚继光的一些夫妻间的琐事。又如《沈石田画》是写明中叶四才子之一的沈周的。他俊逸高雅，放荡不羁，藐视官府，讥讽草包官吏，读后使人耳目一新。属歌颂正义战胜邪恶的有《戚侍郎》不怕鬼；《皮龙儿》中李胡子报仇；《薛纱帽掠女》中薛某抢掠民女，被讼死狱中；《地羊驿》描写了在贵州地羊驿的少数民族地区，官吏欺污少数民族妇女，被“木易一足”的事等。表现了作者疾恶如仇的积极思想。属笑话传闻类的如《大言》条中，作者录了十余则传闻，有“武昌熊维禎谈：其邑因江涨，漂一物如鱼鳞于田间，大如席。或曰龙鳞也”。“姑苏有直指使诣学宫，大风吹下一布巾，横直皆丈余。”“又有核桃可容五斗籍。”“一大鹏鸟毛……独其孔横置地上，平步入之无碍。”等

等。作者之所以用《大言》作标题，可见他是斥这些传闻是不负责任的吹牛。又如《男子失驴》，则写一赶脚男人，心术不正，欲调戏乘驴的妇女而失三驴的笑话，使人从笑声中得到启发。

当然，书中的糟粕也是不少的。除上述几类中点到的一些外，还有斥农民起义为贼寇，诬农民反抗为盗，鄙视少数民族，鼓吹因果报应等，都反映了作者的正统思想和封建道德观念。

《耳谈》付梓后，对明后期影响很大。据不完全统计，冯梦龙在《古今谭概》、《情史类略》两部笔记小说中，明确记载摘《耳谈》中的条目就有二十多条；曹臣的《舌华录》更是大量转载。更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盛誉的冯梦龙编写的《三言》，凌濛初编写的《二拍》中的不少短篇小说，都可以从《耳谈》中找到因袭的线索。如《杨闷儿》酷似《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陈玄超遇铜帽仙人》与《唐解元一笑姻缘》同出一辙；《娶妇得郎》的情节和细节与《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一模一样；《薛公杨公得父》与《杨八老越国奇逢》骨架相同（以上见《三言》）；《杞县疑狱》与《徐茶酒乘闹劫新人，郑蕊珠鸣冤完旧案》大同小异；《林公大合决狱》与《夺风情村妇捐躯，假天语幕僚断狱》的情节有惊人的相似（以上见《二拍》）等等。看过《耳谈》，再翻《聊斋志异》，就会发现许多篇目的内容基本一样。所有这些，并不是说冯梦龙、凌濛初、蒲松龄等文学大家是直抄王同轨的《耳谈》，而是说这些文学大家晚于王氏数十年、百年不等，他们都读过《耳谈》，再则历史文化是在继承中发展起来的，王氏的《耳谈》肯定对其后的文学家起到过很大的作用。关于这方面的考据，留待中国小说史家去进行，恕笔者偷懒。

四

《耳谈》开始写于何年无资可考。只知成书付梓为明万历丁

酉年，即公元1597年。据《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四·子部·小说家类存目二》记：“《耳谈》十五卷，为安徽巡抚采进本，”并指出：“前有陶冶序，称其事不必尽核，理不必尽合，文不必尽讳。亦小说家之定评也。”

《耳谈》成书后，共付梓两次。一次是明万历丁酉年四月，刻工不详。称“丁酉本”。第二次是万历间金陵世德堂重刊本，没注明付梓的具体时间。可称“世德堂本”。书中有“南新市友人李维桢”作的《序》，武陵江盈科作的《引》，王同轨本人作有《耳谈自序》。纪昀、永瑢编的《四库全书总目》中说的“前有陶冶序”至今仍是悬案。“陶冶”究竟何许人也？尚待研究，“陶冶序”在“世德堂本”中也没发现。恐怕《耳谈》在重刊时，不会将原《序》删去吧！而事又凑巧得很，《四库全书总目》称《耳谈》“丁酉本”陶冶的《序》中有“称其事不必尽核，理不必尽合，文不必尽讳”，却与“世德堂重刊本”中李维桢的《序》的内容一字不差。是偶尔巧合，还是纪昀失误？笔者不敢妄断。但据笔者揣度，“前有陶冶序”应为“前有陶冶文”之误。也就是说，李维桢的《序》为陶冶所书。

《耳谈》的版本流传始末已无资可考，仅从当时文人的《序》、《引》中，和明中后期其它笔记小说的摘引上查找一点线索。

为《耳谈》作《序》的李维桢，是湖北京山县人。隆庆进士，万历间迁提学副使，后三十年无升迁。天启初以布政使家居。年七十余，召修《神宗实录》，累官礼部尚书。史书称其“性乐而阔达，博闻强记，文章宏肆，负重名垂四十年”。

为《耳谈》作《引》的是当时的笔记小说大家江盈科。

江盈科的《耳谈引》，不象李维桢的《耳谈序》那样板着面孔，道貌岸然。而是用诙谐的语言褒奖王同轨。他说：“余生平最喜听奇谭。然腕情疏，管城君不与共事。故朝而入耳，夕而出耳，明旦记忆，辄忘其半。夫耳，等也。在余为邮舍，在行父为

府藏，卹贫藏富。非其耳异，用之异耳。余故读行父之书，赏行父之耳，又复自罪其腕。呼童子进，捶将加焉。腕曰：‘幸赦往昔，今而后愿以三年报政。苟无完书，可悬国门，请受捶百。’余因释焉。且推之曰‘腕勉乎哉’！三年而书成，当遂题曰《腕谈》，以配行父之耳。”

然而，《耳谈》却没有流传至今。甚至书名也鲜被人知，《四库全书》仅存一书目。

笔者整理的《耳谈》底本，经历了一个不平凡的过程。

起初，台湾伟文图书出版有限公司印行了一套《秘籍丛编》，其中有《耳谈》单行本（五卷），被称为“存世绝罕之稿本”（《秘籍丛编》凡例）。笔者读后，发现台湾出版的乃是世德堂五卷本。但台湾的专家整理工作十分粗糙，特别有许多断句，不仅割断了文义，有些简直到了不可卒读的程度。决心重访稿本，重新校点、注释。但费时年余，几乎访遍全国各大图书馆及馆藏目录，均未发现纪昀在《四库总目提要》中说的“十五卷本”（亦即“丁酉本”）。于是，本人妄加臆断，认为真正的十五卷本，已在修订《四库全书》中毁掉了。其重要理由是《耳谈》“文不必尽讳”，正触清乾隆帝之大忌。因此，便就台湾出的五卷本为基础，与明以后的笔记小说参校，并以笔者所学，重新标点、简注，并辑佚一卷成六卷本。当稿子完成交出版社后，发现北京图书馆有“十五卷”丁酉本《耳谈》的线索。经与出版社商妥，抽回书稿，决定重访版本，整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列表存目的十五卷本《耳谈》。

然而，查访一个孤本谈何容易！别说复制，就是从善本书库提出来看一下，不知要办多少手续，过多少关口。这里面的苦衷，恐怕诸多同行会有同感的。为此事，我曾惊动过国务院古籍出版规划领导小组而未成功。但我不甘心，继续努力，终于在1987年夏复制了十五卷丁酉本。于是，日以继夜、夜以继日开始整理，甚

至在病发住院手术后第六天，爬在病床上还在赶抄稿子。其目的是让这一埋藏数百年的文学遗产，尽快与读者见面。

五

这次校注整理依据的丁酉本《耳谈》，因为是孤本，无法选本对校，台湾出的五卷本因种种原因，只能参考，所以，笔者只有据文意自校和与正史及明代其它笔记小说进行他校。在校勘时，发现原版漏讹舛误较多。笔者没采取径改原文和出校附校勘记的作法，而是经过考证后，在篇后的“注”中列出：凡错字在注中写明，漏字据文意和本书前后文及其它作品对校后增之，补不上者存疑，错简之处作调整。凡属校勘，均在注码后加“案”字标明。幸于近期访到《耳谈类增》五十四卷本，得以补漏。

《耳谈》十五卷本，刻工一般，错讹屡见。凡错讹之处，本人径改之，不再出校和加注。这次重新标点的《耳谈》，一律使用规范化的新标点。但由于该书内容繁杂，经史子集、神卜星相无所不包，本人功力又浅，点错的地方肯定不少。

在注释过程中，采取了简注，以疏通文意。对一些名物制度，典故出处等，除个别外，一般不作烦琐的考证。

校点古籍，是一门综合的学问，需要有较广的知识面和深厚的学术功力。笔者读书甚少，孤陋寡闻，搞这项工作自感不称职，但在几位老前辈的指导和鼓励下，勉强为之。能以此拙作就教于国内时贤、前辈，取得诸同行的批评，将感激不尽，受益非浅。

在整理工作中，北京图书馆、安阳师范专科学校图书馆无私地提供资料，中州古籍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弦声及王鸿芦老师给予了具体的指导和鼓励，刘长耿同志题写书名，在此一并致谢。

孙顺霖

一九八八年十月

• 11 •